

□李惠铭 李沛然

《王家卫访谈录》收录了近三十年来的二十二篇王家卫访谈。访谈的内容及出现顺序反映了王家卫的电影对中国香港评论界和国际评论界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前四篇访谈主要针对王家卫的头两部电影：《旺角卡门》和《阿飞正传》。第五篇采访提到了王家卫的第四部作品，让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重庆森林》。最后四篇访谈都以《一代宗师》为主题——两位美国影评人认为这是一部功夫电影，而中国的影评人则认为它是一部有关民国时期的时代电影。二十二篇访谈里有十七篇最初是用中文或法语发表的。另外，早期的访谈主要来自香港杂志《电影双周刊》，这些访谈在网络上是找不到的。它们为无法查阅香港地区档案馆档案的读者提供了资源。

与大多数香港导演不同，王家卫不惧怕借鉴伟大的电影导演和文学作品。有些影迷说他的电影文学性太强了，他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象。

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王家卫的人生经历和对他有影响的艺术为基础去解读他的电影？“20世纪60年代三部曲”（《阿飞正传》《花样年华》《2046》）似乎反映了王家卫刚刚和母亲一起从上海搬到香港时对香港的印象。在多场访谈中，王家卫都提到了和母亲来到香港时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因为不会说粤语，他知道自己是外来者。

在香港生活多年之后，王家卫感到上海人正在失去他们的身份。如今，上海人和广东人已经没有区别了：只有香港人。《花样年华》是他“展示上海人群体的真实面貌”的尝试，因为就连当代上海人都不太了解他们的群体、习俗和仪式。王家卫力图在他的影片中留住那段历史的吉光片羽。《花样年华》的英文字幕省略了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上海人生活方式中的一些小细节。因为这最初是一部有关食物的电影，王家卫在片中张曼玉和房东一家吃的东西上花了很多心思。影片中提到的上海人家里吃的一种蔬菜暗示了时令。

《一代宗师》也尝试留住一些即将逝去的东西——这一次是不同的武术流派。影片原名《大师们》，王家卫不仅仅想表现叶问和他的武术流派，他想要通过叶问及其身边人的故事展示好几个武术流派。令王家卫感到遗憾的是，与武术相关的文化传统正在消亡，因为中国只将武术看作教练训练学生的运动，而不是师傅像父亲一样教导徒弟的门派。他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让公众重燃对学习武术的兴趣，不将其视为一项运动，而是将其看作一种传统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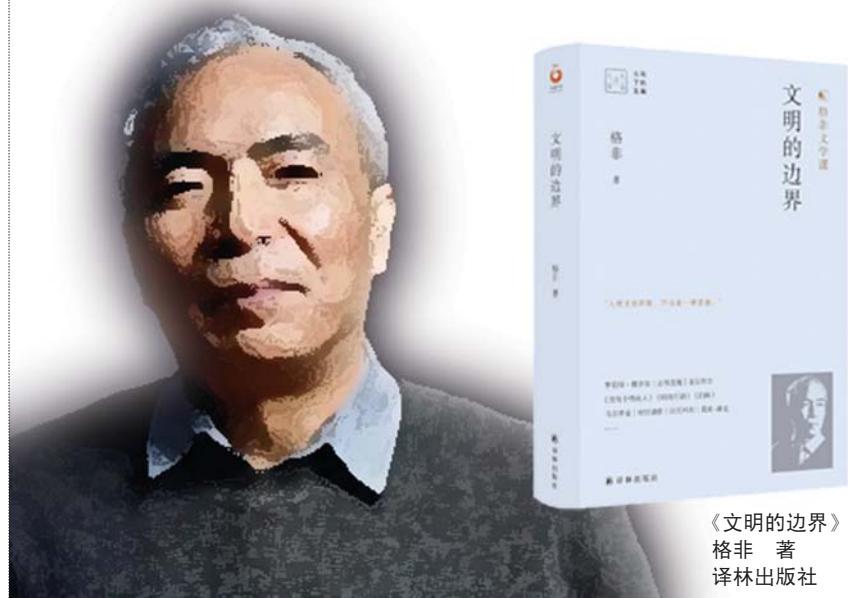
回答有关其艺术视角的问题时，王家卫总是三缄其口，观众对王家卫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在采访中，王家卫很擅长解释他的影片是如何拍摄的，但很少谈对自己作品的看法。记者一旦提到他的作品是艺术电影，他就会反驳，并表示自己的影片其实很商业化。1995年接受麦圣希采访时，王家卫被问及偏爱平实的表演还是戏剧化的表演，他的答案进一步展现了他对自己作品的暧昧态度。王家卫答道，只要是好的表演都可以；然而，“很多时候好的演技是你说不出来的”。当被问及是否喜欢某种特定的电影类型时，他又说只要是好电影都喜欢。

尽管王家卫不太愿意列举对他有影响的电影导演，但他并不避讳分享自己对喜欢的电影导演的看法。刚到香港的时候，王家卫和他母亲每天都去电影院。他们每天都看好几部电影，不论是好莱坞、欧洲的电影，还是日本的电影。大学期间——以及经他的合作伙伴谭家明介绍——王家卫看了小津安二郎、黑泽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埃里克·侯麦和罗伯特·布列松的作品。1994年接受杨慧兰和刘慈匀的采访时，他提到布列松教他不要做无用功。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模仿布列松，在封闭的小空间内拍摄特写镜头。他高度评价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他认为这是史上最好的电影。在另外一次访谈——关于分段式电影《爱神》中王家卫执导的《手》——中，王家卫指出，安东尼奥尼的《蚀》让他明白，电影主角不一定是人，也可以是空间。

文化评论家和影迷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因为他们欣赏影片中对话、内心独白和叙事的文学性。果不其然，王家卫热爱阅读，他对文学的热爱在他的影片和采访中都有所体现。中国现代文学是王家卫拍摄电影的灵感来源。《东邪西毒》关注两位主人公——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东邪和西毒——的早年经历。《花样年华》和《2046》的灵感来自刘以鬯——一位在上海出生与成长的香港作家——的《对倒》和《酒徒》。《花样年华》和《2046》让香港学者再度关注刘以鬯的作品。《爱神》中的《手》改编自施蛰存的《薄暮的舞女》。

当然，王家卫的文学知识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1994年接受林耀德采访时，他探讨了自己成长过程中阅读的书。因为他的父亲认为小时候应该多读经典，王家卫很早就开始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为了与“文革”期间留在内地的哥哥姐姐保持联系，王家卫写信和他们探讨世界文学，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约翰·斯坦贝克、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后来，王家卫还阅读了日本作家的作品，如川端康成、安部公房、太宰治和横光利一；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如鲁迅、周作人、老舍和穆时英；还有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让王家卫看到了非线性叙事的可能性。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和《红唇》也是王家卫喜欢的作品。

《王家卫访谈录》
李惠铭 [英]李沛然 编
邵逸 译
守望者 | 南京大学出版社



□禾刀

如果你觉得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与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原著难读，那不妨先读一下格非的这本《文明的边界》吧。

本书是2018年至2020年格非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小说叙事研究”课的讲稿。格非之所以选取这三位作家，是觉得三人都是以传统自然过渡到现代文明的居间者视角创作，都将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自己作品最重要的主题，通过各自的写作试图重构现代性的时空关系。本书中，格非以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麦尔维尔的《白鲸》为主线，从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出发，兼顾讨论了作家的其他作品，特别是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早期作品，从中梳理作家思想孕育的脉络，至而聆听三位“隐士”对文明的沉重叩问：究竟什么是现代文明的边界？它到底要将我们带向何方？

就我个人而言，很喜欢这个标题，因为准确地概括了三位作家的共同特征，同时也让读者带着问题开启本书的阅读之旅。作为文学课讲稿，格非尽可能拓展知识视野，除了将三位作家投射到所处的时代，还将他们与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著名作家进行对照。需要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对卡夫卡等人一味膜拜，而是辩证地分析各自优长。如在谈到穆齐尔与卡夫卡时他就认为，“穆齐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涵盖卡夫卡的一部分主题，卡夫卡则无法涵盖穆齐尔”。

在序言中，格非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强烈质疑和反思，是19世纪以来所有伟大小说的共同特征”。工业革命后，欧美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均迈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人类延续数千年的乡村秩序渐被打破，以城镇为中心的新社会秩序正亟待建立。而从全球格局看，大航海时代后，世界新的力量基本形成，同时意味着传统世界秩序同步发生蝶变。所有的变化不会波澜不惊，而会转化成一个个具体的事件，飘落到每个社会个体的身上。

《没有个性的人》的故事时间设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间有着某些巧合。故事里的乌尔里希在“平行行动”中迷失了自我，试图寻找“另一种状态”或“另一个地方”。实际上无论哪种“状态”或者“地方”，均不过是人类寄居的地理符号。当空间环境依然如故，地理意义上的变更并不会产生根本上的意义。《暗夜行路》的作者志贺直哉有着日本“小说之神”之称。志贺直哉笔下的主人公任谦作一出生便背负着沉重的伦理文明十字架。他曾作过多次尝试，每次以为逃出生天，但还是碰得头破血流。麦尔维尔写作《白鲸》，显然与自己的捕鲸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当别人在疯狂地捕鲸赚取利润时，他却从中觉察到飞蛾扑火般的文明危机。不过，对于“裴廓德号”船长亚哈，我并不觉得他的全部野心真就是为了奔赴一场毫无意义的灭亡——毕竟他以捕鲸为生，万一他成功了呢？当然，如果他成功了，就不会存在这部不朽之作。亚哈之所以对这头名为莫比·迪克的抹香鲸存在严重的误判，更深处的思想源头，很可能来自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他坚信人类力量无往而不胜。当然，或正是这种盲崇，才注定了他葬身大海的宿命。

作家思想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一点从作家早期作品便可见端倪。在讨论志贺直哉的《流行性感冒》时，格非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现实主义，得出“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并呈现出某种‘病态’的‘地下室人格’”。而在《白鲸》中，格非从麦尔维尔先前完成的《抄写员巴比特》里，“挖掘”出曾经负责“死信”处理工作的巴比特，而捕鲸船上也有不少无法捎带的死信。

格非还导入尼采的孤独哲学，借此指出三位作家的“遁世”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置之世外的超脱。所谓旁观者清，大抵亦是此理。穆齐尔为躲避二战炮火，四处流亡；志贺直哉一生中搬家多达26次，这一点与张爱玲有点相像，后者晚年据说受虱子困扰，4年搬了180次。强烈的生活不安感，迫使他们一次次选择逃离；麦尔维尔一直在海洋与陆地、城市与孤岛的生活之间摇摆，缺乏归属感。如果说作品是个人内心的外化表现，那么，他们作品中流露出的“遁世”与孤独，恰恰是他们对现实的态度。

回到本书书名来看，“文明”一词的出现，其实带有鲜明的人类一厢情愿视角：人类夸夸其谈的文明，是否与自然秩序相适应？如果我们从人类最终灭亡的角度观察，今天人类所倚重的那些文明规则又有多少意义？回看人类发展史，不仅人类，地球上所有生命源头均指向茫茫大海，从这层意义上讲，《白鲸》里的“裴廓德号”奔向大海，是否又寓意一种返璞归真？

文明到底是什么？本书没有给出答案。不过，这种对文明的质疑，足以也应引起人类的警惕。不仅三位作家所处的百多年前，即便今天，关于文明的探索依然没有停歇。文明到底是强者施加的逻辑，还是一种普遍公认的自然法则，依然未见共识。摆在眼前的事是，当种种打着创建更先进文明，更具破坏性、毁灭性武器的诞生，人类并没有比历史上更加安宁，反倒陷入更大的不安之中。即便是那些以种种和平名义发明的智能机器，越来越引起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家的不安，担心未来智能机器很可能控制人类，将人类变成智能的附庸。这又让人想起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里，智能控制了人类从胚胎到死亡的一切，一切均在智能掌控之中。届时，文明又何在？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颜莉

关于王家卫，听他自己说

